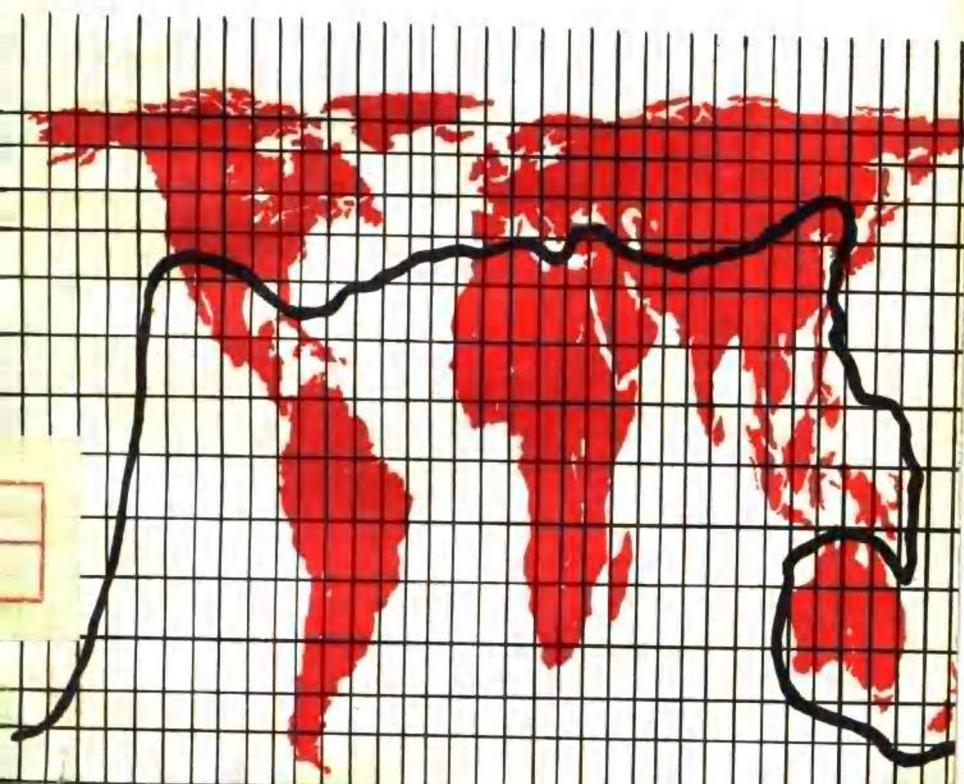


争取世界的生存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争取世界的生存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天津、上海新华书店经销
各省省会所在地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220·4

1981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57,000 千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1
定价：1.10 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原名：《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是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由各国十八位政治、经济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一份报告。它根据比较丰富的最新资料，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现存矛盾的角度，广泛地探讨和论述了国际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就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当然，由于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论述都需要我们加以分析，特别是在当前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争夺愈演愈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和矛盾有日趋扩大之势的情况下，书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否行得通，还有待事实来验证；尽管如此，由于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代各种尖锐矛盾的实际情况，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各国政府的重视，对我们研究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翻译及校订工作的有如下一些同志：赵湜、刘山、宋光炜、杨静予、陈德宜、赵慧先、梅天。由于本书涉及范围较广，有些部分也较专门，译文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1980年9月

争取世界的生存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

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

维利·勃兰特

阿卜杜勒·拉蒂夫·Y.哈马德	(科威特)
罗德里戈·博特罗·蒙托亚	(哥伦比亚)
安托万·基布萨·达科雷	(上沃尔特)
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	(智利)
凯瑟林·格雷厄姆	(美国)
爱德华·希思	(联合王国)
阿米尔·H.贾马勒	(坦桑尼亚)
拉克希米·坎特·杰哈	(印度)
哈蒂贾·艾哈迈德	(马来西亚)
亚当·马利克	(印度尼西亚)
森治树	(日本)
乔·莫里斯	(加拿大)
奥洛夫·帕尔梅	(瑞典)
彼得·G.彼得森	(美国)
埃德加·皮萨尼	(法国)
什里达特·兰法尔	(圭亚那)
拉亚希·亚凯尔	(阿尔及利亚)

当然委员

扬·普龙克	(荷兰)
耶兰·奥林	(瑞典)
德拉戈斯拉夫·阿夫拉莫维奇	(南斯拉夫)

委员会工作人员

秘书处

执行秘书 耶兰·奥林

秘书处主任 德拉戈斯拉夫·阿夫拉莫维奇

利亚卡特·阿里

罗伯特·H.卡森

S.古汉

贾瓦德·哈利勒扎德赫-希拉齐

马撒·F.劳特夫

贾斯蒂尼安·韦耶马穆

格哈特·G.蒂巴什

主席的私人班子

主席特别助理 费里茨·菲舍尔

米夏埃尔·霍夫曼

编辑顾问

安东尼·桑普森

简称

本文中主要使用的机构简称如下：

经(济)合(作)会议	国际经济合作会议
经互会	经济互助委员会
欧经共同体	欧洲经济共同体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总协定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普惠制	普遍优惠制
世界银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开发协会	国际开发协会
劳工局/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局/劳工组织
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官方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
经合发组织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石油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
贸发会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工发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封面地图是根据彼得斯投影而不是根据人们更熟悉的麦卡托投影绘制的。

彼得斯投影有一些革新的特点：陆地面积画得更为准确；生动地再现了整个世界的表面，包括两极地区；赤道位于地图正中；通常(东西)一百八十条经纬线和(南北)各九十条经纬线的地理坐标网格被把地球东西和南北各分为一百块十进位等级的网络图形所代替；自北到南和自东到西的主要方向的角度准确。

显现出来的表面投影变形分布在赤道和两极；据称，居民最稠密的许多地区相互呈适当的比例。这一投影是表现和以欧洲为世界地理和文化中心的流行概念不同的一个重要办法。

本图是得到不来梅大学阿诺·彼得斯博士的特别许可印制的。

目录

简称	v
要求变革的呼吁：和平、正义、就业 ——维利·勃兰特的导言	1
一、 北方 - 南方：背景情况	27
二、 发展的规模	49
三、 相互的利益	68
四、 最贫穷国家	84
五、 饥饿与粮食	98
六、 人口：增长、迁移和环境	115
七、 裁军与发展	128
八、 南方的任务	138
九、 商品贸易与发展	154
十、 能源	175
十一、 工业化和世界贸易	188
十二、 跨国公司、投资与技术分享	205
十三、 世界货币秩序	221
十四、 发展资金：未得到满足的需求	243
十五、 供应发展资金的新途径	262
十六、 国际组织与谈判——总的看法	285
十七、 优先兴革事项	296
附录一： 建议汇编	313
附录二： 委员会及其工作	325

要求变革的呼吁： 和平、正义、就业

导言：维利·勃兰特

1978年夏天，在我们着手工作半年后，一位朋友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非洲领导人给我拍来一份令人振奋的电报。他说，我们的委员会可以对“制订世界范围的道德准则作出贡献”。

不应该由我来判断我们是否已经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重大的期望。但不管怎样，本报告论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的一些需要。它讨论了作为我们时代巨大的社会挑战的南北关系问题。我们想强调指出，我们深信未来的20年对于人类可能是命运攸关的。我们希望普天下肩负责任的世界公民认识到，许多全球性问题都将在这段期间达到严重关头。但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远远等不到本世纪末，而是立即需要处理的问题。

本报告谈到一些重大的危险，但它绝不接受任何类型的宿命论。它力图证明威胁着我们子孙后代的致命危险是能够避免的；只要我们有决心，那我们就有机会——不管我们住在北方或南方，东方或西方——在和平与幸福，团结与尊严中缔造世界的未来。

从发起成立这个独立的委员会之时就开始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经历。对我以及对别人来说，这都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教育。我们的有利之处是不必担心牵涉到国家的威望，也不接受无论来自何方的指示。我们无意取代各国政府或国际机构。但我们力图对决策人提供支持，并向他们所依靠的公众发出呼吁。

我们不仅来自世界许多地区，而且，由于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担任过各种负责职务，信念不同，经验也迥异。随着我们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和争辩，我们发现我们对希望中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要实现这些希望需要解决的某些重大问题，逐渐取得了共同的看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协商一致竟然变成了现实。

1977年12月我们第一次在波恩附近开会时，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正如我们在工作范围内说的）“研究因国际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不平衡而引起的全球性严重问题”。我们还答应“建议对有关发展事业和消灭赤贫现象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在我们后来讨论结论时，我们甚至更加强烈地感到，改建世界范围的南北关系已成为人类未来的一项关键性义务。我们认为，这和击退军备竞赛的威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本世纪未来的年月中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球责任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它只有不超过一代人的历史。这是联合国的概念，联合国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经燃起了对一个平等和正义的世界的希望（和幻想）。

在两年间，在一系列深入进行的会议上，我们讨论和争辩过大量的问题，就许多建议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若干建议上有分歧。我们的报告不打算成为一份技术性文件。对我们建议的

主要意图和最后一章中的优先兴革事项，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其他各章也是集体思考的结晶，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并不完全同意其中的每一句话。

我从我的同事那里获益非浅，在代表他们讲话以前，我想谈几点自己的意见。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权利主持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我并不感到惊异。坦白地说，按照我本人的经历，我并不一定适合担任这个工作。但是从自己的缺点中学习往往有助于一个人和他的同事打交道。

当我是反对独裁政权的年青新闻记者时，我就注意到殖民主义和争取独立斗争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也考虑过非殖民化和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发展问题。在多数人，至少是我处的那部分世界地区的多数人，甚至连第三世界或不结盟运动的肇始都还没有听说过的时候，我就见到了尼赫鲁、纳赛尔、铁托和其他领导人。阅读、旅行和交谈使我对亚洲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有所了解。1971年，当我对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金致答谢词时，或是在我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后我在联大发言时，以及在其它场合，我都没有忘记提非殖民化和发展的问题。但是，无庸讳言，作为政府首脑，其他重要事务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使我无法认识到南北问题的全部重要意义。我的同事中有些人当时就曾主张重新估价我们确定的先后次序，而我的确对他们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我始终关心着对发展问题采取的新做法。1974和1975年，阿尔及利亚和墨西哥的总统把他们呼吁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议告诉了我。但是那些劝我承担建立和主持本委员会的任务的人也许想到的是我对人们称之为**东方政策**所作的贡献。那时的问题是：能否用现实主义的合作至少是部分地取代欧洲各部分之间的无益和危险的对抗？能否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争论的沉

重负担下找到共同关心的领域？

结果是欧洲的和平与合作得到了加强，虽然直到现在为止在限制军备方面收效甚微。不过我的体会是，人们能够通过达成实际可行和建立信任的协议来推动事态发展，使旧有的冲突不会导致新的冲突，从而改善政治气氛。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还能够改变冲突的性质。这的确是一条我想运用到我们对南北关系问题的研究上来的经验。

如何改弦易辙

关于南北对话已经谈得很多。对这一对话已经作出了认真的贡献。但也有大量机会和善意没有得到利用。靠成见或一厢情愿的想法肯定解决不了把富国和穷国分割开来的那些有争论的难题。要处理这些问题，就必须具有消除危险的紧张局势和为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但首先是为人类——带来有意义和有益的成果的愿望。

我再说一遍：为全世界。委员会既不想陷入论战之中，也不想回避棘手的问题。为了全球的需要和普遍作出努力，它的确赞成苏联及其盟国更多地参加进来。同样重要的是，应该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合作，并在这样做时，使别的国家从它的经验中获得好处，因为它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这些国家进行的高级别接触以及在其中某些国家的首都举行的专家会谈，都着重说明了本委员会力图比皮尔逊委员会 10 年前所做到的更向前推进一步。

本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必要对建立一种适合所有国家的新型关系深入进行重新考虑。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相信有必要采取行动，就有可能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内实现这种变革。由人们制造出来的问题也是能由人们加以解决的，我

们不应放弃这一希望。

这就要求各国人民之间和各个国家之间实现谅解，承担义务和相互支援。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具有现实感，并对交织在一起的利益有深刻的理解，即使这些利益并非一致的。这也需要有勇气和远见，而没有远见任何伟大的任务都是无法完成的。当进行这些努力时，必须本着相互尊重、不带偏见和以诚相待的精神行事，不仅乐于提出批评，也要愿意听取批评。

变革和改革不能靠单方面来实现，而是必须得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如果我们是真诚的，想促进国际了解，我们就不应该回避任何认真的交换意见。不幸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还能看到浪费和腐败，压迫和暴力。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工作不能等这些和其它的坏事都消灭干净后再来进行。我们住在南方或北方的人都应该坦率地讨论少数显贵的滥用权势，全凭热情的盲目行动，千百万难民的悲惨处境，或是在国内外有损正义与团结事业的对人权的其他侵犯。

本报告将正式提交联合国秘书长，并通过他送交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它能到达全世界公正无私和值得信赖的男女手中。我们有此奢望，即让普通人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是怎样同世界另一端的别的社会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要求他们进行思考，通情达理，并采取合乎人情的行动，从而帮助缔造共同的未来。

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我们说过，本委员会首先要设法使决策者和公共舆论相信“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经济关系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我们也答应要“慎重考虑联合国关于发展问题的决议以及近年来在国际会议中探讨过的其他问题”。

大多数人都知道现存的国际机构体系是 35 年前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而南方——主要是作为国际舞台上的新手——面临着许多需要从根本上加以纠正的不利条件。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当然，根本性变革并非文件的产物，而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是在人们的头脑中酝酿着或预示要发生的事物的一部分。

我们对很快就将担负主要政治责任的年青一代抱有殷切的期望。我们希望他们能更强烈地坚持要求同人，而不是同死板的抽象概念或图谋私利的机构打交道。我们也希望他们更关心人的价值准则，而不是官僚主义的规章条例和专家治国论的条条框框。我们对教育必然要起的伟大作用深信不疑：对国际事务——南北问题绝非不重要——的更丰富的知识将开拓我们的眼界和提高对别的国家，甚至遥远国家的命运以及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的关心。本委员会认为全世界的学校都应更重视国际问题，以便使青年人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他们自身的责任和在全球、区域范围以及他们毗邻地区内进行合作的机会。

到 2000 年时世界上还会有很多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这是个实际的危险。世界上可能人口过剩，肯定会过度城市化。大规模饥馑和毁灭的危险性可能不断增加——如果新的大战还没有把我们称之为世界文明的基础动摇了的话。

在矛盾中建立秩序

我们意识到本报告正是在富国对持续“衰退”的前景和国际关系日趋不稳定深感忧虑的时候发表的。

我们认为这些困难比过去的历次衰退和经济危机的困难更加严重。因此如果认为可以用过去几十年惯用的手段来克服这些困难，那是危险和不真诚的。

很多当政的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也许认为现在提出进行根本变革最不合时宜。怎么能设想关心自身严重问题的工业国家会采取影响深远的大胆步骤来加强同发展中世界的合作呢？但是我们认为，恰恰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刻需要处理世界的基本问题和采取大胆的首创行动。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的苗头，即认为人类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但是这种认识直到目前为止还不够强有力，不足以阻止当前的潮流。自 1977 年 12 月我们委员会首次开会以来的短短期间，国际局势更加恶化了。世界的前途似乎很少受到象现在这样严重的威胁，这样说并非夸大其词。但是要把世界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南北之间的冲突，也是虚妄之谈。我们的世界是多方面的，世界发展也不仅是个经济进程。正如我们委员会一位成员在讨论快结束时谈到的，世界的新的几代人需要的不仅是经济解决办法，他们还需要能产生这些办法的思想，能鼓励这些办法的希望以及能实行这些解决办法的最初措施。他们需要一种对人、对人的尊严和对基本人权的信念；那种对正义、自由、和平、相互尊重的准则，对爱和宽宏厚道，对理性而非力量的信念。

当争取国际关系新结构的斗争在继续进行时，非经济的因素也受到了更认真的考虑，这就是：宗教和种族的因素、教育和公共舆论。和平是所有宗教、信仰和哲学的目标。它是所有种族、民族和教义的伟大愿望。难道不能够从这种愿望中产生出一种共同的和平激情，把它作为我们各项事业的感情上和道德上的推动力吗？但即使对这点也不应抱幻想。和平、和解和其它共同价值准则不会自动得到发展。从广义上开展对和平的探索可使我们鉴别各种冲突之所在，并使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不再导致军事或经济战争。从区域性共同体的经验中产生的全球

一家、至少是全球责任的思想必须得到发展。

从各种矛盾中建立秩序看来是人类的一项经常性任务。重建国际关系的努力只要能够建立在类似的价值准则的基础上，就能得到无可估价的支持。来自教会和宗教团体以及人道主义的动力能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团结，从而帮助解决南北之间的问题。

毁灭还是发展？

本报告的基础是看来最简单的共同利益：人类要求生存；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它有求生存的道德义务。这就不但引起了和平和战争这类老问题，也引起了如何消除世界性饥馑、大规模苦难和富人与穷人生活条件惊人悬殊的问题。

如果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共同点，那么本报告论述的是和平。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的角度来想到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由大规模饥馑、经济灾祸、环境灾难和恐怖主义所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想到减少对和平的传统威胁，还要想到必须化混乱为秩序。

在新的十年开始之际，也就是距离千年周期只有 20 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尽量摆脱日常的争吵（或谈判），看到咄咄逼人的长远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贫困和饥饿仍然在幅员辽阔的许多地区流行；资源被浪费而没有考虑到它们的更新；生产和销售的军备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积聚的毁灭能力已经足以把我们这个星球摧毁好几次。

缓和紧张局势和实现更大程度合作的政策是没有任何别的合理代替物的。快速解决的办法只是幻想；极端重要的是必须建立更多的信任和制止昂贵的尖端武器的螺旋式不断增加。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会导致危险的武装冲突。已经作出努力

来缓和东西方关系的最重要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武器的生产和销售仍在继续增长，并且很容易变得无法控制。我们可能已经在把自己武装起来投入死亡。

军备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少为人所知。现在人们刚刚开始了解到，如果只把非生产性的军费开支的一部分用到发展事业的生产性开支中去，就能开辟出什么样的前景。每年的军费帐单现在已接近 4,500 亿美元，而官方的发展援助还不到这个数字的 5%。下面是四个例子：

1. 仅仅半天的军费开支就足以资助世界卫生组织的全部根治疟疾方案，而根治使成百万人受苦的河盲症，需费还要少些。
2. 一辆现代化坦克约需 100 万美元；这笔数目可以用来改进储藏 10 万吨大米所需的设备，从而每年可少浪费 4,000 吨或更多的大米：一个人每天只需一磅多点大米就够了。同样的钱可以修建供 3 万儿童用的 1,000 间教室。
3. 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价格（2,000 万美元）可建立 40,000 所乡村药房。
4. 一年的世界军费开支的千分之五就足够为增加粮食生产和使粮食不足的低收入国家在 1990 年前达到自给自足支付所需的全部农业设备的费用。

“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如果不包括在裁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样的秩序能使人满意吗？限制洲际毁灭性武器的协议是会受到欢迎的，但它们不能代替裁军。

在各军事集团控制着尖端武器的情况下，过去 30 年内北半球维持住了和平，而地球的南部却爆发了暴力动乱和军事冲突。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大大增加了它们的军备，有时是为了保护它们合法的或可以理解的安全利益，但有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有时则是受到武器生产国的怂恿。新老武器供应者